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討論女性獨立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的政黨形象認知，研究過程主要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以 2004 年總統大選的全國性選後調查資料(TEDS 2004P)來探討女性獨立選民的獨特性；接著透過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詢問女性獨立選民對國、民兩黨的政黨印象，進一步釐清她們是如何建構出政黨的形象內涵；最後則是提出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限制，並提出一些建議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學者參考。

第一節 女性獨立選民的特質

在本節筆者將依據從 TEDS 2004P 調查資料的發現，對女性獨立選民的一些組成特質，作一簡要式的概述。

首先，在獨立選民性別的構成成份中，顯示女性仍佔獨立選民人口的大宗，延續了過去幾位研究者對國內獨立選民研究的發現(如葉銘元，1994；莊天憐，2000；朱曉玉，2004)，且佔全體選民人口中 1 成 7 的比例，這在台灣選舉競爭日漸走向兩大政黨抗衡的態勢下，具有影響選戰最後結果的地位。

其次，那具有什麼樣特質的女性容易成為獨立選民呢？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年齡在 60 歲以上及 40~49 歲者、中低教育程度為主、居住在北部地區、職業為家管、家庭收入愈低者、具有已婚身分等特徵的女性，較有機會成為獨立選民。其中在年齡和教育程度和過往的研究有稍許的出入，在年齡方面，不同於生命週期理論所預期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政黨認同愈趨強烈，年齡愈長的女性反而易

成爲獨立選民，這或許跟她們長久以來經歷一連串的政治動亂，導致她們愈遠離政治有關；在教育方面，過往的研究也都指出獨立選民的教育程度是較低的，而本文發現女性獨立選民以中教育程度的比例佔多數，其次才是低教育程度，這多少可從朱曉玉(2004)研究 2000、2004 年總統選舉的發現中得到一些解釋，女性獨立選民雖然以低教育程度者居多，但高教育程度的比例卻有增加的趨勢，這顯然與教育的普及化，提升了整體選民教育水準不無關係。

再者，女性獨立選民在政治涉入程度方面，是否有如傳統理想公民所形容的對政治事務積極涉入並培養其政治興趣，許多實證研究指出獨立選民對政治的參與不及於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本研究也發現女性獨立選民的政治涉入程度確實是不高的，不討論政治的比例佔絕大多數，並且其政治知識也低於一般的女性非獨立選民和男性獨立選民。由此可知女性獨立選民是不符合傳統理想公民的條件，她們反而是對政治較不感興趣、疏離的一群人。

最後，則是討論女性獨立選民對於政黨的態度，著重的焦點在於她們對政黨形象的認知，儘管缺乏政黨認同，但亦不代表她們對政黨毫無概念或想像。她們大多數對國民黨的形象認知爲代表台灣人利益、代表有錢有勢、與黑金掛勾、及具有執政能力的政黨，對民進黨的形象認知則爲代表台灣人利益、代表一般民眾利益、清廉的、及具有執政能力的政黨，由此看來女性獨立選民對民進黨的政黨形象評價是高於國民黨的政黨形象評價。Lin(2005)研究 1992~2000 年台灣選民對政黨形象的評價時，發現近 10 年來民進黨得到越來越多的正面形象評價，而國民黨則面臨到越來越多的負面評價，這間接也可以說明爲何國民黨在 2000 年時會黯然地下台，而民進黨可以順利開啓其執政時代。女性獨立選民是不是也是助民進黨成功政黨輪替的其中一個要角，是一個值得再探討的現象，不過由於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此，所以並未再多著墨於此。

第二節 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形象的認知

過去有關研究獨立選民與政黨形象間的關係，指出獨立選民對國、民兩黨的評價都是低於該政黨的認同者，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有較高比例的獨立選民不清楚或不知道兩黨的政黨形象(葉銘元，1994)，在台灣以女性獨立選民高於男性獨立選民的比例來看，似乎可以預期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的形象認知是較為模糊的，但透過焦點團體的訪談，仍可發現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的形象並非全無概念，她們有一套建構政黨形象內涵的方式，在透過控制不同變項的操作後，發現不同特質的女性獨立選民對國、民兩黨形象的詮釋會有所差異，如此，本節就依她們對國、民兩黨的集體形象認知，及在受不同教育情境因素、政治涉入程度影響下對國、民兩黨所產生的形象認知來簡要說明。

一、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總體形象的認知

從焦點訪談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女性獨立選民在不受教育情境，和政治涉入程度因素的影響下，的確是能夠對國民黨、民進黨勾勒出一些較鮮明、具體的形象特色，但實際上這些形象也可能是較為模糊的刻板印象，和一般選民對這些政黨既存的普遍印象相似。整體而言，女性獨立選民對兩黨的政黨形象主要是建立在對社會大環境變動的關懷上，更確切地說選民是由國民黨時代躍進到民進黨主政時代的過程中，以對比的模式來形塑兩黨的政黨形象內涵，如在政治人格上，國民黨的貪汙腐敗(黑金政治)反映出民進黨的清廉操守(清廉有活力)；在民主風氣上，國民黨時代的專斷獨裁(缺乏民主訓練)到民進黨時代的抗爭遊行、及漸進的民主改革(提升民主意識)；在社會安定上，則呈現出民進黨在沒有充裕的各部門專業人才及缺乏中央執政的經驗下(人才不足，缺乏執政經驗)，導致政策朝夕令改或施政效果不如預期，再加上民進黨執政不過短短幾年也牽扯出一連串政府官員的工程弊案、貪汙事件(黑金政治)，使社會呈現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如此選

民自然而然會感念國民黨過去為台灣社會所帶來的貢獻(社會安定)。

從另一角度觀之，相較於以往有關選民對政黨形象的文獻來看，大部份的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在政治議題、或政治立場上(如統獨議題、兩岸關係等)的差異有清楚的印象，如認為國民黨傾向與中國統一，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但我們從焦點團體的訪談中，卻發現女性獨立選民甚少描繪兩黨在這方面的形象內涵，這似乎某種程度上可說明女性獨立選民是較遠離政治，不習慣或不喜歡以意識形態或抽象觀念的途徑來理解政黨，其所關注的是一般比較社會層面的面向，以經驗取向為主，兩性這種不同的思考、行為模式或許跟他們從小在認知發展上的差異有著密切關連。

再者，在民主意識面向上，以往的量化研究大多數肯定國民黨在民主改革上貢獻(徐火炎，1991；劉義周，1994；游盈隆，1995；王興中，1995)，不過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選民對於民主意識的提升則較歸功於民進黨(陳明通，1998；游清鑫，2002；鄭夙芬，2004)，而本文的研究發現女性獨立選民對民進黨在民主意識的提升上是較為肯定的。

二、女性獨立選民在教育、情境因素影響下對政黨的形象認知

女性獨立選民在分別控制不同教育程度及情境差異之下，對政黨形象的建構上確實呈現出不同的內涵，就形象的量的多寡上而言，高教育程度非家管者都能分別對兩黨描述出數個形象，相較之下，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對兩黨形象的認知就顯得寥寥可數，只有分別對兩黨各指出一個政黨形象。

就形象的內涵面向而言，高教育程度非家管者關注的層面較為多樣化且具體，包括政黨在經濟、生態環境、人才多寡、基層建設、政治人物特質、及大眾媒體前的表現等，都是她們評價政黨的主要來源，而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就較著重在與其生活經驗相關的形象論述上，如政黨是否對台灣的關懷上有著濃烈的情感，進一步批判國民黨的缺乏本土化，肯定民進黨對中下層選民的照顧。

最後，再就形象的正、負面評價而言，高教育程度非家管者對兩黨的正面評價都是多於負面的評價，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囿於缺乏處理政治資訊的能力，對兩黨的正、負面評價則顯得不夠具體。以下分別就兩黨形象論述，高教育程度非家管者對國民黨正面形象的評價主要包含了帶動台灣經濟發展、擁有充足的人才資源、注重政黨在傳播媒體前的表現、馬英九的人格特質及對地方基層的建設，負面形象評價則是在論述忽略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相較之下，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對國民黨的正面評價就顯得非常模糊，幾乎無法說出特定的政黨形象內涵，負面評價則強調國民黨缺乏本土意識。高教育程度非家管者對民進黨正面形象的評價包含了對其法律人才的充裕及地方基層建設的肯定，負面形象評價則主要集中在批判該黨成員的草莽、好鬥性格；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對民進黨的正面評價指出該黨是較具親和力且照顧中下階層選民的政黨，不過卻沒辦法具體描述出該黨的負面形象，呈現出和對國民黨正負面評價相反的情況。

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對國民黨的正面評價顯得非常模糊，並且沒辦法具體描述對民進黨的負面形象，意謂著低教育程度家管者對國民黨難以產生正面的認同，對民進黨難以產生負面的認同，這或許可和前一章調查資料中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形象印象的結果相呼應，女性獨立選民對國民黨的印象偏負面(如代表有錢有勢、與黑金掛勾的政黨)，對民進黨則偏正面印象較多(如代表台灣人利益、一般民眾、清廉的政黨)。

三、女性獨立選民在政治涉入程度因素影響下對政黨的形象認知

女性獨立選民在分別控制不同政治涉入程度差異之下，對政黨形象的建構上呈現出和控制不同教育情境差異下的另一種面貌，就形象的量的多寡上而言，低政治涉入程度者對國民黨形象認知是略多於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對民進黨的形象認知則反之。前者主要是因低政治涉入程度者雖對政治感受不深，但透過政治的運作直、間接影響到她們的社會生活，使其無法忽略周圍環境的變動，如此對國

民黨形象的量比較多，但也比較偏社會層面的印象，而高政治涉入程度對國民黨的形象則比較集中，講求政治運行中人才甄補和媒體前形象的維護；後者主要是因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對民進黨講求其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此形象的種類比較多樣一點，而低政治涉入程度者對民進黨形象則較少描繪，亦較集中於社會層面。

就形象的內涵面向而言，這兩群人都論及兩黨在本土意識形象的內涵，不過有趣的是低政治涉入程度者是站在批判國民黨壓抑本省民眾的角度出發，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則是肯定民進黨在本土化文化上的推動。其他的形象內涵，低政治涉入程度者的論述則屬較表面(以政治人物代表黨的形象，如馬英九形象，或僅知民進黨主要政治人物基本學識背景)，且較關心攸關自我生存的大環境(如地方基層建設、生態環境的維護)，因對政治不甚感興趣，如此也幾乎未提及相關政治事務內容論述；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因具備較豐富的政治資訊，其論述則顯得較具體且深入，除了論及黨人才資源多寡的重要性外，政黨在政黨政治的運作之下所扮演的制衡角色也是評價的來源，另外也能在本土意識形象中，進一步區分政黨是對本土文化的尊重或是對族群分化的操弄。

最後，就形象的正、負面評價而言，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對兩黨的正面評價都是多於負面的評價，甚至對於國民黨都沒有提到負面形象，低政治涉入程度者則未對民進黨的負面形象多加論述。以下分別就兩黨形象討論，低政治涉入程度者對國民黨的正面評價主要包含馬英九形象、地方基層建設，負面評價則是缺乏維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和本土性的不足；相較之下，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對國民黨的正面評價著重在黨政人才資源的運用，及政治人物在傳播媒體面前的表現評價上。低政治涉入程度者對民進黨的正面形象評價則偏向非關政治領域(政治人物法學背景及地方建設)，並且也無法說出負面形象的內涵；高政治涉入程度者對民進黨正面形象的認知是來自於該黨尚未執政前的制衡角色，及強調愛護台灣本土文化的訴求，但也由於過分劃分族群上的差異而形成其負面評價的來源。

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文除了上述對女性獨立選民的特質和對政黨形象認知的發現之外，亦有些部分值得我們再作討論，主要是在量化資料和焦點團體訪談的運用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以及企圖從研究結果中和相關理論文獻產生對話。

首先，女性獨立選民在政治涉入程度方面，產生矛盾的現象，政治興趣高者，政治知識卻未必如此。一般選民研究大都發現政治興趣愈高者，政治知識也愈高，反之亦是，而教育即是影響政治知識最為關鍵的因素(黃秀端，1996)。本研究發現政治涉入程度的多寡和教育程度沒有必然的關係，它們並非呈線性發展。本文的調查資料雖亦顯示女性獨立選民的特性是低政治興趣、低政治知識的一群，然而從焦點訪談參與者的基本資料顯示卻非如此，高政治興趣者，其政治知識未必是高的，反之如是；此外，觀察訪談過程時氣氛熱絡之程度亦是一項很好的參考，低教育程度組別的女性獨立選民對政治相關議題討論之熱烈甚至高於高教育程度組別的女性獨立選民，這其中的差異乃涉及到女性生命週期之發展，低教育程度的女性獨立選民大都經歷了婚姻和養兒育女的過程，在孩童稚齡時關心托育政策是否完善，在孩童進入求學階段則關心教育政策之實施，如此對政府及政治相關事務會投入較高的關注力，相對地對政黨的形象也較容易描繪；而高教育程度的女性獨立選民通常是較年輕、晚婚的一群，其生命經驗較缺乏，相對地對政治也不必然那麼關心。一般女性非獨立選民是否和女性獨立選民存有這種政治涉入感的內在矛盾，是值得往後的研究再加以探討的。

過去對政黨形象的研究，甚少提及情境因素的影響，但在性別方面的研究，則強調情境因素是影響女性政治參與的重要一環(Weisberg, 1987)，如此研究女性獨立選民則必需將情境因素納入考量，本文將情境因素以家管／非家管為主要觀察點，從本文調查資料顯示，女性獨立選民以家管者佔絕大多數，顯示了情境因素確實會影響女性成為獨立選民的可能性；在焦點團體方面，由於教育程度的高

低和家管／非家管的相關性很高，本文嘗試以低教育程度家管者、高教育程度非家管者來探討其政黨形象的認知，避免對政黨形象內容的描述產生過多的重複性，研究結果發現這兩類型的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形象的內涵，確實產生了不同的形象認知，顯示情境因素對女性在建構政黨形象內涵時，的確是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也是本文和過去其他相關政黨形象研究所不同的地方。

其次，本文量化資料中顯示女性獨立選民對民進黨的喜歡程度高於男性獨立選民、女性非獨立選民，且喜歡民進黨的分數略高於國民黨，在該資料中發現女性獨立選民對於民進黨的印象來得比國民黨正面，如認為民進黨是代表台灣人利益、代表一般民眾利益、清廉的政黨，而國民黨則是代表有錢有勢者、及與黑金掛勾的政黨，或許也可說明女性獨立選民為何會對民進黨喜歡的程度略高一點。

另外，女性獨立選民對民進黨的喜歡程度略高於男性獨立選民，可從兩性對政黨認同的差異來談，Norlander(1997)即由於女性強調人際連結和網絡關係，如此女性對社會團體的評價高於男性，相對地在對政黨的評價相對上亦會高於男性。

此外，女性獨立選民對國、民兩黨的喜歡程度高於女性非獨立選民，且喜歡民進黨的分數略高於國民黨，可能之因除了女性非獨立選民內部具有政黨認同者對他黨、或敵對政黨的喜歡程度減損下所造成的結果外，焦點團體訪談亦支持此結果的發現，女性獨立選民在不受教育情境、政治涉入程度影響下，其對於民進黨所產生的正面共同形象的量是多於國民黨的正面共同形象，或多或少顯示女性獨立選民對於民進黨的印象來得比國民黨稍為好一點。

國內早期研究政黨政象的相關文獻指出選民對國民黨的印象較正面，對民進黨的印象較負面(徐火炎，1991；游盈隆，1994)，而 Lin(2005)的研究則指出近幾年來民進黨的正面形象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國民黨則在負面形象有增加的趨勢，如本文在調查資料及焦點團體訪談的結果是較支持 Lin 的研究發現，女性獨立選民對民進黨的印象來得比國民黨正面。

接著，Sanders(1988)的研究指出社會環境會影響選民發展出不同的政黨形

象，如女性由於角色社會化的緣故，使其對政黨形象較沒有具體的印象，但從本文的調查資料及焦點團體所得到的結果來看，事實並不盡然如此，首先從調查資料中政黨形象的四道題組來看，女性獨立選民在每一道題目的回答上，其選擇模稜兩可(如兩者皆是、兩者皆非)的比例遠低於對立的政黨形象形容詞句(如代表有錢有勢、或一般民眾利益的政黨等)的比例，顯示女性獨立選民是有能力分辨不同政黨的形象；從焦點團體資料中，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形象描繪的層面多樣化可知，她們對政治或政黨並非毫無概念，對政黨形象的認知是來自於如教育情境、政治涉入程度等因素影響而建構出不同的政黨形象內涵，如此在透過焦點團體的討論過程更能進一步引導女性獨立選民抒發她們真實想法。

另外，Baumer 和 Gold(1995)認為政黨形象同時受到當代的政治議題所影響，這種發現可以從焦點團體訪談內容中得到印證，由於「台灣女性獨立選民之探索」計畫之施行正值民進黨陷入一連串黑金弊案當中(如高雄捷運工程弊案、陳哲男事件等)，許多參與者在論及對民進黨的印象時，大多會提及民進黨在此黑金政治上的形象，顯示了政黨形象並非像政黨認同一樣強調穩定性，而是容易受到一些短期的議題、候選人等因素影響(游清鑫，2002)。

相關文獻指出政黨形象會影響政黨體系的變遷(Trilling, 1976)、選民的投票行為(Baumer、Gold, 1995；徐火炎，1991；游盈隆，1994；王興中，1995；郭琮淵，2006)，而本文的研究也認為這些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確實存有形象的認知，那麼政黨所形塑出來的政黨形象勢必會影響她們在投票上的抉擇，在現今兩大政黨競爭激烈的態勢下，政黨若能產生較多正面的形象，相信更能爭取到這些女性獨立選民的選票，以增加該黨勝選的機會。

再來，女性獨立選民當中是否也包含了隱性的獨立選民(leaning independents)？由她們對於國、民兩黨的正面評價大部分都是多於負面的評價，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既然她們對政黨有較多的正面評價但卻為何無法發展出政黨認同？雖然前述文獻曾提及由於兩性的社會化和生命經驗的差異，男性強調政治上的獨立性，女性強調人際連結和社會認同(Gilligans, 1982)，使得女性相較於

男性對於社會團體普遍存有較正面的情感，如此看待政黨會來得比男性正面，亦較會發展出政黨認同(Norrander, 1997)，但女性獨立選民卻沒有往政黨認同方向發展，這或許可從國外在探討選民政黨認同¹²時，又將獨立選民進一步區分為隱性的獨立選民(leaning independents)、純的獨立選民(pure independents)此方向來思考，其研究發現隱性的獨立選民通常比純的獨立選民、及弱的政黨認同者對於政治的參與來得更積極(Dennis, 1988a；Keith et al., 1992；Norrander, 1997)，那麼在研究台灣的女性獨立選民時，其中是否也包含了這些隱性的國民黨、隱性的民進黨認同的獨立選民呢？由於台灣的測量方式並非像美國政黨測量的方式，有專門列出一獨立選民的選項可供選擇，僅將受訪者在政黨認同回答都不偏者視為獨立選民(葉銘元，1994：54-55)，因此並沒有辦法完全得知其結果和國外是否相同，但從焦點座談參與者討論內容的過程中，還是可隱約發現有些女性獨立選民的言論或者立場是略稍偏具政黨的色彩，雖然她們在我們篩選的過程中自稱為是不偏向任何政黨的選民。前述文獻提及具有政黨認同者對其所支持的政黨，其正面評價會來比他黨、或敵對政黨高，若是女性獨立選民中也包含了這些隱性的政黨認同者，或許就能提供說明為何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的正面形象描述會多於負面形象的一種解釋，這種發現是在大型面訪資料中所不易觀察到的，透過焦點團體訪談的經驗正好可提供我們另一條脈絡來觀察。

最後，要討論的是本文採用經驗調查研究所得到的分析資料和焦點團體的運用，對研究結果有沒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基本上，筆者是持肯定的態度，例如從量化資料可知女性獨立選民對國民黨的印象是黑金腐敗的政黨，民進黨是清廉的政黨，透過焦點團體的訪談結果，我們可以瞭解到女性獨立選民把黑金概念和國民黨產生連結，源自於她們長久以來生活的經驗或刻板印象，例如選舉時買票賂選、政府官員與財閥長期利益交換等等，導致最後此印象的產生，而民進黨清廉的形象則是相對於國民黨的貪汙腐敗而來，透過比較的方式，產生對另一個政黨

¹² 傳統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歸類細分之下有以下 7 幾類：強的民主黨認同、弱的民主黨認同、偏民主黨的獨立選民(Independent Democrats)、純的獨立選民、偏共和黨的獨立選民(Independent Republicans)、弱的共和黨認同、強的共和黨認同等。

的印象；此外，焦體團體也提供了其他的訊息，大部份的女性獨立選民也逐漸把黑金和民進黨掛上等號，這不排除受當時政治環境氛圍所影響，不過這提醒我們，民進黨當初所樹立的清廉形象正在急速鬆動瓦解中，當愈來愈多的選民有相同的感受，而政黨亦不改進其作為時，或許民進黨＝清廉這個形象將被黑金取代。

又如在本土意識的形象方面，會發現研究者原本想要測量的概念和受訪者所談的意涵並不完全相符，本土意識應包含較具政治性的概念，如台灣獨立等，但在焦點團體中，女性獨立選民甚少提及與此相關的政治性問題，而或以維護台灣文化、關懷本土、省籍差異的論述為主，且隨著不同教育情境、和政治涉入程度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詮釋。這些發現是在一般的經驗調查所忽略的，透過焦點團體所得到的結果，可回饋到研究者在研究設計的問題方面，使其測量的方式更能貼近受訪者的思維模式。



第四節 檢討與建議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女性獨立選民是如何建構出現今台灣主要兩大政黨的形象，在進行政黨形象分析前，如何界定出誰是女性獨立選民是首要第一步，由於學者對於獨立選民的定義，一直沒有產生一致性的共識，因此要將獨立選民的概念操作化也產生不同的研究方式，本文參考國內、國外文獻對獨立選民的定義，將選民的行為面和態度面納入考量，將獨立選民界定為「不具任何政黨偏好，且投票行為不具規則性的選民」，即選民在政黨認同的表態上是不偏向任何政黨者且在前幾次選舉所投票的政黨是不一致的，即為獨立選民。

在操作方式上，從調查資料先撿選政黨認同態度上都不偏任何政黨的女性選

民，再進一步檢定這些女性選民在不同時期選舉投票給政黨的一致性時(表四十五)，發現兩次同時投票給同一政黨的一致性相當高(信度高達 0.768)，違背了本文原先所採取的界定，但由於在第一步所篩選出來的不偏任何政黨的女性選民的樣本資料就很少(只有 309 人)，如再剔除投票具有一致性的女性選民，如此樣本的流失勢必所剩無幾，這樣更無法觀察女性獨立選民的普遍特質，所以本文乃從寬界定女性獨立選民的定義，以在主觀認定自己是不偏任何政黨的女性選民，視為女性獨立選民進行分析。會有如此情形的產生，筆者懷疑這可能跟資料問卷的性質有關係，該問卷設計是詢問受訪者在前兩次總統選舉時(2000、2004 年)投票給那個政黨，如果考慮當時的時空環境或許可提供一些解釋，在 2000 年的總統大選時期，國民黨執政多年來的貪汙腐敗、及僵硬官僚化的行政體系一直未見具體改革的成效，加上當時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宋楚瑜的出走，自組親民黨)，「換人做做看」的口號提供了政黨輪替的一個新契機，民進黨得以順利執政；而選民在經一任總統任期後，也發現民進黨所領導的政府似乎不如預期的好，當時的民調也大多顯示泛藍陣營所推出的總統候選人支持度是略微領先民進黨總統候選人¹³，但投票前一天所突發的「三一九槍擊案件」對整個選舉情勢產生了一個非常衝擊性的影響¹⁴，或許使原本仍遊移不定的選民乃決定再一次投票給泛綠陣營的總統候選人，因此表四十五當中，2000、2004 年都投給泛綠陣營的比例高達 88.2%，跟此原因或許不無關係。

若此問卷改以詢問不同時期投票給那些政黨的立法委員，也許較能改善此問題，由於立法委員的選舉跟選區中的選民比較有切身的關係，候選人選區服務的

¹³ 如東海大學的民調中心於 2004 年 3 月 3 日所公佈的民調為連宋支持度 3 成 45，扁呂 3 成 16，資料來源：<http://www.ettoday.com/2004/03/06/11151-1597124.htm>；連宋全國競選總統於 2004 年 3 月 6 日所公布的民調為連宋支持率為 34.8%，扁呂支持度為 29.8%，資料來源：<http://www.ettoday.com/2004/03/06/11151-1597124.htm>；聯合報的民調中心亦於 2004 年 3 月 9 日公佈連宋配的支持度為 4 成 1，陳呂配為 3 成 8，資料來源：「支持率都回升，選情緊繃，連 40%，扁 38%」，聯合報，A3 版，2004 年 3 月 9 日。

¹⁴ 如聯合報於總統選舉後的民調即指出總統大選投票前一天的兩顆子彈，至少牽動百分之八的選票流動，並且根據調查資料推估槍擊事件是讓陳呂和連宋的票數差距一夜之間拉開 20 萬票，使選情逆轉的最主要因素。資料來源：「民調推估 兩顆子彈 一夜拉開 20 萬票」，聯合報，A4 版，2004 年 3 月 22 日。

好與壞是選民較容易感受得到的，如此便容易以此做為投票抉擇的依據，再加上立委的參選人眾多，選民的選擇性自然較多元，如此投票不一致性相對地上機會也較大。

其次，本文只選定 TEDS 2004P 單次的資料來觀察女性獨立選民的特質也不盡完善，但礙於 TEDS 歷年所釋出的資料中，考量到樣本數量及問卷題目類型的不盡相同(如在封閉式的政黨形象題組中並沒有逐年都問)，因此筆者只選定最近一年包含全省各縣的資料來觀察女性獨立選民，如此並不能看出女性獨立選民的長期趨勢是否有產生變動。若能有一為時較長、且問卷類型較一致的大型面訪資料，這樣或許更能觀察出女性獨立選民在這幾年人口數量或其他特質是否有產生變動，她們和男性獨立選民、或者其他女性非獨立選民的成長又有何差異，都是可以再進一步討論和分析的。

表四十五 女性獨立選民兩次總統選舉投票一致性信度分析

		2004 年總統選舉投給哪一政黨？			
		泛綠	泛藍	廢票	總和
2000 年總統選舉投 給哪一政黨？	泛綠	75 (88.2%)	10 (11.8%)	0 (.0%)	85 (100.0%)
	泛藍	13 (31.0%)	28 (66.7%)	1 (2.4%)	42 (100.0%)
	其他	0 (.0%)	0 (.0%)	1 (100.0%)	1 (100.0%)
	總和	88 (68.8%)	38 (29.7%)	2 (1.6%)	128 (100.0%)
Pearson 卡方		$\chi^2=106.473$ df=4 p= .000			
Cronbach's Alpha 值		.768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百分比。

至於在焦體團體的執行過程中也面臨到一些困難，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難題，樣本的不具代表性，由於樣本數過少，其研究結果並不足以推論至整個母體現象，只能代表參與者在焦體團體討論時的意見，但卻能說明研究過程確實有這

些意見的產生，以彌補量化在封閉、或半封閉式的問卷結構下所得到的有限答案。但囿於研究經費和人力的限制，最後在控制不同區域別、教育程度等變數後，選定四組的女性獨立選民進行焦點團體座談。

其次，不同因素組合而成的組別所產生訪談內容上的差異性，是否還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干擾，如當時的政治環境氛圍使然，由於焦點訪談執行的期間正值民進黨中重要黨員涉及重大黑金弊案、及工程弊案，這都無形會加諸選民對政黨一時的負面印象；另外，女性本身的家庭結構問題等的差異，本文並未進一步討論，也使得研究過程顯得不夠細緻和粗糙。

再者，在招募參與者過程中也有實施上的難度，除了現代人防備心較重，及詐騙集團猖狂的雙重因素下，另外還有就是年輕的女性選民不易招募，尤其是孩童年齡幼小的女性更是如此，她們仍無法克服傳統上加諸於女性在家務、照顧幼童等的包袱，多少也限制了她們的對外參與能力，McGlen(1980)指出即便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她們和男性在政治參與上的表現仍差異甚大，主要的原因在於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一旦步入婚姻後，面臨到母性角色和政治行為的相衝突，女性身兼職場和母職的責任，往往使她們難以雙重兼顧，導致她們在政治參與上不如男性高。女性若可能克服這種兩難(如政府或企業能提供更完善的育嬰政策或其他配套措施等)，相信整體女性的政治參與力會提高不少。

最後，由於本文只將研究焦點放在女性獨立選民對政黨形象的認知建構上，屬實於獨立選民研究中的冰山一角，若能同時研究男、女性獨立選民，又或者是同時研究比較泛藍、泛綠、獨立選民等女性對政黨形象評價的差異，相信更能提供一套完整且更豐富有關獨立選民的細緻分析。